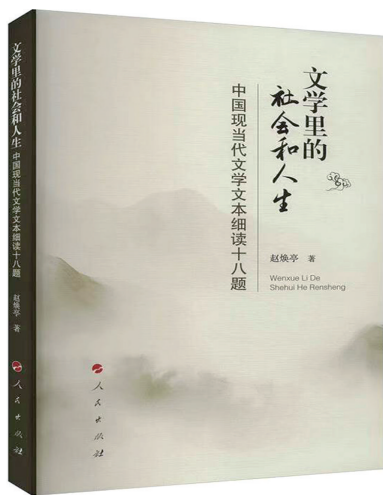


从文本进入历史文化深处

——评《文学里的社会 and 人生》

沈喜阳



《文学里的社会与人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细读十八题》

赵焕亭 著

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

任何成为经典的文学文本，一方面必定带有时空性，一方面必定具有超时空性。带有时空性，是指该文本打上了出生时的时代思想文化烙印；具有超时空性，是指该文本能被不同时空的读者接受。当一个文本“出生”以后，亦即一个文本被创作和发表以后，这个文本就脱离了作者而成为一个读者阅读与阐释的对象。在阅读和阐释中，读者给予作品更多的内涵，而作品给予读者更多的教益。按照中国传统儒家孟子的教导，在阅读评价文本时，我们必须牢记孟子的话，一方面要知人论世，一方面要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就是进入文本所产生的时空，探究文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以意逆志，就是以读者之意逆作者之志，透过文本的表象，进入作者的内在意蕴（包括情感意蕴和思想意蕴）深处，有时候还要做到清代谭献所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赵焕亭教授的《文学里的社会与人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细读十八题》就是这样一部细读文本、一切从文本出发（入乎其内），但最终从文本进入历史文化深处（出乎其外）的既知人论世又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著作，入乎其内，即立足文本之中，故能有的放矢言之有据；出乎其外，即跳出文本之外，故能由表及里层层递进。

从文本进入历史文化深处，需要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自“出生”起就脍炙人口，在岁月的长河中历尽颠簸，终于成为有定评的现代散文名篇。作者解读《背影》，当然从文本细读入手，但又绝不仅仅限于文本细读，而是扩展到朱自清创作

《背影》的具体时代的家庭、社会 and 历史文化背景，从朱自清父子的现实矛盾（家庭）、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影响（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历史文化）三方面深入考察《背影》的文化语境。这三方面中，朱自清与父亲的现实矛盾是最具体的，也是最表层的；这种父子之间的矛盾又是时代社会思潮在家庭中的反映，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人的发现所带来的自由与专制的矛盾冲突在朱自清与父亲身上的体现；进一步深挖下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又与中国传统思想难以割舍，传统与反传统的交锋是整个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大环境。小家庭和小个人、大社会和大时代、深层历史与文化，这是从共时性角度来考察《背影》。而对《背影》“出生”（1925年发表）以来的百年接受史的考察，并总结出《背影》接受的“春晖时代”“寒冬时代”和“夏日时代”，则是历时性角度的考察。作者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手法，从文本进入历史文化深处，把《背影》作为一个麻雀，解读其内在五脏六腑的根源和外在羽毛骨架的特点，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背影》的诞生和接受，不正是我们民族百年来精神思想和历史文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从文本进入历史文化深处，需要知其然更需要知其所以然。其第二部分的标题即是“诗歌、小说、剧本里的历史侧影”，作者从诗歌、小说、剧本的具体文本出发，当然不是仅仅局限于“历史侧影”，而是深刻呈现了20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状况，又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文学思潮、政治风云和社会现象，以历史侧影勾画文化精神，从文学文本进入民族心理意识深处。比如书中选择丁玲的短篇小说《水》和赵清阁的短篇小说《旱》进行三方面对比研究，一是从主题思想上而言，《水》充满批判性，而《旱》具有激励性；二是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水》是“速写体”，《旱》是“剧本体”；三是从文艺观上着眼，《水》体现了左翼文学观，《旱》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观。从这三者的分析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研读文本先从文学形式方面入手，对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在文学特征上予以具体分析；但作者不仅分析探究其然，而且分析探究其所以然，把揭示出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从个案分析进入整体把握，从《水》与《旱》的对比，我们可以窥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多元化的文学生

态，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深思中国当时的文艺思潮本来可以齐头并进，左翼的普罗文学与自由主义的精英文学本来可以各行其是；其所对应的乃是“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参考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更是民族主义与个人自由的消长（参考秦晖的《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矛盾的《腐蚀》，既是心理小说，又是政治小说，作者更认为《腐蚀》是张扬“理想人性”的教育小说。作者的这一论断，就不仅仅是局限于《腐蚀》本身，而是从多方面进行分析评判而得出的结论。矛盾是深受鲁迅影响的作家，可以说直接继承了鲁迅的衣钵，鲁迅对理想人性的探究在矛盾的思想深处打下烙印。鲁迅的“理想人性”就是“立人”。首先，作者考证出矛盾《腐蚀》直接引用鲁迅《半夏小集》之七的内容；其次通过矛盾在《腐蚀》连载期间发表的《“最理想的人性”——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来找出两者之间的脉络；最后回到《腐蚀》文本自身，从小说主人公身上找到了“理想人性”的元素。这都是追本溯源、探骊得珠的体现。

从文本进入历史文化深处，需要建立大文学文本观。自从西方文学概念（literature）进入中国以来，我们的文学研究就仅仅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类。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学概念的狭隘化。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文学，乃是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文学。我们完全可以把日记、书信和传记都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并由此切入作家的内心世界。书信最能以独特的方式，传递人间真情和心灵密码。其实第一章中《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和《〈两岸书〉中大爱无疆、大道低回的精神品格》两节内容就是解读书信的。前者是对书信解读的解读，并由此归纳出赵清阁与老舍交往的世界、韩秀与傅光明交往的世界和傅光明自己的精神世界；后者则直接解读中国台湾诗人痖弦与河南平顶山作家杨稼生的两地书，从中窥见痖弦的德善情怀和杨稼生的善良仁爱。本书对传记作品加以解读，本身就是对现有四类文学作品的突破，其前提是扭转一直以来只重视传记作品的史料性而不重视传记作品的文学性的偏见。传记作品背后依然有历史文化及情感心理的积淀，依然值得细细挖掘。作者对陈漱渝《搏击黑暗——鲁迅传》的评述，特别强调其时代性、学理性和文采性；尤其是对该传记文学性的文本细读，可见作者完全是把该传记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的。建立大文学文本观，不仅是视传记作品为文学作品，而且是把他人传记与

作家作品相结合，从传记中读出作家的作品意蕴，从作家的作品中读出传记意味。按照郁达夫所引述的法郎士的观点，“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施建伟的《林语堂传》、关纪新的《老舍评传》、黄昌勇的《王实味传》、朱珩青的《路翎传》都能把传主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思想倾向、文学密码以及人物原型、故事原型结合起来；作者对这些传记的解读，正好印证了作者关于社会和人生在文学家身上的结合就是“文学”的见解。其实作者以传记研究的路径来解读文学作品，在《〈牛棚小品〉显示丁玲晚年的创作个性》中已经展现出来。

英国文学批评家瑞恰慈提出的“细读”（close reading），是美国新批评派的看家武器。然而这种“细读”的不足恰恰在于它仅仅重视文本自身，而不涉及文本之外。窃以为赵焕亭教授的《文学里的社会与人生——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细读十八题》所运用的文本细读，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所全面展示的文本细读功夫，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示范性的文本细读方法。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种细读文本的方法，总的原则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要进入文本内部，又要打通文本外部，从文本出发，而进入文本所内涵的历史文化深处。具体来说，就是把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不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还要具有一种大文学文本观，这样才能真正沟通社会与人生，情感与心理，文学与思想，历史与文化，才能真正恢复中国文学以人文化成天下的大文学观。这正是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任》中所强调的：“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文学在中国民族的意识中，必须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的范畴。无论是创造文学还是研究文学，必须培养人的人文主义素养，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世间真情，历史侧影，纪实人生，归根结底都是生命的映射，都是最可宝贵的人的生命的绽放；文学是人学，文学更是生命之学，让生命在人间散发出芳香和美好，让生命更有价值和意义，只要生命长在，文学就会长存。

